

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⑤

文學博士

夏志清

黃維標

一、文學「博」士

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夏志清博士，不是一般的文學博士。有人說，在學術的天地裏，對最小的事物，知道最多的人，是博士。然則，文學博士就是對文學上某個小問題，如「詩經」的小雅、馬致遠的小令、或者愛爾葛(Alcott)的「小婦人」，知

道最多的人了。當然，要做一個文學博士，小題大知之外，文學上普通的大、中問題，也要具備小知，否則，那張文學博士證書，是不會輕易到他手上的。可是，一般的文學博士，也只能做到大題小知，小題大知而已。人類的古典文學，累積了幾千年，作品已多如恒河沙數，而當代文學，復以一日千篇、數不勝數的速度產生；你可以天真得有讀盡世間書的宏願，但到你頭來一定對着文學的大海大洋，感嘆一己的小知小識。我國古代以通古今者爲博士。處身於二十世紀，而要徹底博通文學的中外古今，那只有神才可以，凡人不得妄想。

夏志清先生是凡人，不過他比一般文學博士博學通識。一般的文學博士是學位上的博士，夏志清是學問上的博士，是博通文學的真正文學博士。

二、通識：博觀作品

熟識理論

隨手翻開夏氏的批評論著，我們都可以找到他博

學通識的證據。夏著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論到張愛玲「金鎖記」的收場時說：

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白痴」中挪斯塔霞死了，蒼蠅在她身上飛（批評家泰特 Allen Tate 在討論小說技巧的一篇文章裏，就用這個意象作爲討論的中心）。這景象够悲慘，對於人生够挖苦的了。但是「金鎖記」裏這段文章的力量，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。套過滾圓胳膊的翠玉鐲子，現在順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……讀者不免要想起約翰·鄧恩有名的詩句「光亮的髮鐲繞在骨上」（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）。七巧是特殊文化環境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女子。她生命的悲劇，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，引起我們的恐懼與憐憫。（頁三四八）①引文短短二百餘字裏面，夏志清提到了杜斯妥也夫斯基、泰特、鄧恩、亞里士多德。亞氏認爲悲劇喚起觀眾憐憫與恐懼的情緒，這是文學常識，並不表示什麼淵博，其他徵引就不同了。夏志清是小說專家，而能徵引詩人的句子，我們讀至鄧恩「光亮的髮鐲繞在骨上」這裏，怎能不眼前一亮？夏志清得的是英語文學

博士學位，而能徵引杜氏這個俄國小說家的作品，我們怎能不承認他的兼通？夏志清不但讀了杜氏的小說，連杜氏小說的論文也不放過，我們怎能不佩服他的淵博？

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這章張愛玲專論中，夏氏還說：「僅以短篇小說而論，她〔張愛玲〕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珠非兒、泡特、韋爾蒂、麥克勒斯之流相比，有些地方，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。」（頁三三五）這裏短短一兩句話，已經蘊藏了批評家多少學問！有學問才能有信心，有信心才能以此大氣魄、大手筆作中西的比較。

夏氏「中國古典小說」一書，論「紅樓夢」那章說道：「『紅樓夢』有別於『源氏物語』和『往事追憶錄』那類小說，雖然三者規模相當，主題也彷彿相近。」（頁二六六）日本的「源氏物語」和法國的「往事追憶錄」，是篇幅繁浩的巨著，而夏志清拿它們一來與「紅樓夢」相比，這自然又是大氣魄批評家的大手筆。有人也許會懷疑：夏氏真的讀過這兩本外國小說的全文嗎？他大概只讀了提要，就信口雌黃一番吧！外國長篇小說提要一類的書，舉手可得，誰不

會走捷徑讀提要，假冒博學？不過，我們繼續看夏志清的文章，就會知道他讀的不可能是小說的提要，而是全文。夏氏的話這樣繼續：

〔「源氏物語」和「往事追憶錄」〕兩本小說中的愛情，最初是驚訝，最後或則厭足，或則厭惡，都是有始有終的：源氏、史蹟、馬塞爾他們，愛得既堅且長，不過，到了最後，才知道深情熱戀，消散如雲烟，徒惹哀傷。「紅樓夢」中的痴情男女則不同：愛情的終結到底如何，他們得不到體驗的機會……。（頁二六六）

批評者沒有讀過那些小說的全文，這些話是說不出來的。②

夏志清的文章，每一篇都密密麻麻地充滿着學問。余光中先生十多年前論散文的藝術，強調密度的重要。他說當時流行的散文，「一味貧嘴，不到一CC的思想竟兌上十加侖的文字」③，大大不以為然。（最近大陸的散文家秦牧，有類似密度的說法。他指出，某些作品「水分很多，人們讀了所得無幾，就好比幾粒米要想煮一鍋粥，淡而無味。」④）以言文學批評文章中學問密度之大，當今中國作家之中，應以錢

鍾書和夏志清爲代表。

作品讀得多，是夏志清這位批評家一個了不起的地方。夏氏於一九二一年出生^⑤，爲江蘇人。一九四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。大學時期已大量閱讀文學名著，畢業後，「閉門讀書」不輟（「人」頁一八〇）。一九四七年赴美入耶魯大學英文系，拿到耶魯博士學位後，教書、做研究，沒有一天離開過文學。他既然科班出身，讀書和研究自然有計畫、有範圍、有方法；他又是嗜書如狂的人，涉獵廣而雜，文學書籍無所不窺。夏氏常常說某某書他讀過，某某書他未讀過，對沒有讀過的書，總表示點歉意。在「文學雜誌」等文章裏，夏氏那種「此書未曾讀過，慚愧慚愧」的心情，表露無遺。「文學雜誌」中，夏氏提及一篇報導龐德（Ezra Pound）晚景的文章。龐德的長詩 *The Cantos*，連寫幾十年，詩人晚年對自己這篇作品，很感失望，嘆道：「我把它寫糟了。」夏志清看報導看到這裏，頗有「大快人心」之感；「至少像我這樣多少年來一直未被龐德吸引的人，覺得今生不細讀 *Cantos*，也無愧於心了。」（「文」頁一九四）夏氏沒有在文章裏表示過，他有讀盡世間名作的

宏願；可是，在字裏行間，我們不難體會到夏氏這種超人的願望。林黛玉之出生，乃爲了還眼淚的債；夏志清之出生，則可說爲了還讀文學作品的債了。

要做批評家必須先博觀，要做大批評家更必須如此。我國偉大的批評家劉勰說：「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；故圓照之象，務先博觀。」這是無可置疑的真理。夏志清博觀，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。最近夏氏在臺北和青年朋友談文學批評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不管是批評家或創作者，在中學、大學都應該盡可能把一些經典之作看過，中西作品都要看，最少十年的預備工夫。……做個批評家要多看書，沒看到不了大境界，氣度不夠嘛！」^⑥這完全是他的經驗之談，是有志從事文學批評者的座右銘。

博觀作品是批評的重要條件，但不是充份條件。二十世紀是講究方法學的時代，各門學問都有方法學，文學批評也不例外。本世紀文學批評的方法學，舉其大者，有馬克思主義批評論、心理分析批評論、新批評論、神話基型論、結構主義論等。

夏志清對這些方法學，絕大多數非常熟識，且運用自如。他深懂馬克思主義那一套，否則不可能在「

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中目光灼灼地探討大陸的文學。讀夏氏論「紅樓夢」、論白先勇小說等文章，我們知道他透視了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。

夏氏一向佩服艾略特這位新批評學派的祖師，他又是新批評學派健將勃魯克斯(C. Brooks)的入室弟子(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中英文版的作者自序，都提到這位「恩師」)，他對新批評學派的來龍去脈、優劣得失，簡直瞭如指掌。夏氏所寫的批評，從大處下筆，而往往能從小處着眼。論「紅樓夢」一文是一佳例。他析論這本巨著的儒釋道思想，這是大的一面；他有時對書中幾個字眼，裂眦觀看，尋出其多義性，這是小的一面。「紅樓夢」第一一九回記賈寶玉離家前，向寶釵道別：「姐姐，我要走了。你好生跟着太太，聽我的喜信兒罷。」後來又對着衆人，仰面大笑道：「走了，走了！不用胡鬧了！完了事了！」夏志清前後讀過「紅樓夢」四次，寶玉離家這一節讀得非常仔細，所以體會到小說作者字斟句酌的苦心。夏氏這樣評析道：

這一場面和前一場面一樣，利用若干關鍵字眼(「走了」、「喜信兒」、「胡鬧」、「完了」

」)的多義性，以加強主角雙重道別的戲劇情節：表面上，他離家不遠，竟然又哭又鬧，有點小題大做；實際上，他要離開的是這個紅塵，要斷絕六親。(頁二九五)

夏志清這裏所提到的多義性，正是新批評學派所重視的。他們所珍惜的反諷、結構等等，夏氏也珍惜：反諷一詞，經常在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的篇頁出現；結構的完整性，則是他論「老殘遊記」小說藝術時所持的一項標準，「中國古典小說」導言對結構完整的重要，也說得很清楚。

神話基型論(Archetypal Criticism)的主要用語如神話、基型、普遍性象徵，時時見諸夏氏筆下：「中國古典小說」導言提到基型角色，「紅樓夢」一章論及這本小說第一回的天地初開神話(creation myth)，又論及大觀園的象徵作用。夏氏說：「就象徵性而論，大觀園可視為受驚少年的天堂，他們接近成年的忡忡憂慮，這裏一掃而空。……」(頁二七九)又說香囊在大觀園的出現，有如「蛇入了樂園」，震驚了賈家的長輩。夏氏的批評，卓見處處，這裏所述，是他衆多精彩的筆觸之一。神話基

型論只客觀、冷靜地分析作品，而不涉及評價問題，夏志清對此頗有微詞，但他對此派理論，顯然極有認識。

結構主義的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探求、歸納「千篇」作品的「一律」。不過，結構主義術語多，給人理論極為複雜深奧的感覺。夏志清既是批評家，對這門近十來年相當流行的新學說，自然非留意不可。一九七五年夏氏為吳魯芹先生的「師友·文章」作序，這樣提到他與結構主義所結的緣：「前一陣想一知『結構派』(Structuralism)文藝理論之究竟，讀了兩本入門書，叫苦連天。……『結構派』理論簡直有些像微積分，比我們中學裏讀的代數、幾何難上幾倍。」(「人」頁一二六、七)

由上所述，我們清清楚楚知道夏志清遍讀古今名著之外，還充份把握各種理論，包括現代最新的理論。這位博大的批評家，從來沒有和文學世界脫過節。

方法學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，有重要的地位。夏志清懂得方法學，但絕不受任何一種理論的框框所囿。對那些特別講究方法學的研究者，則於勸勉之餘，

表示相當的同情：

年輕學人受了這類「強調方法學的」理論家的影響，特別注重「方法學」(methodology)，好像學會一套方法，文學上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；……借用一些新奇的批評方法來檢討一部中國古典作品，至少對洋人來說，其動機往往若非對這本書的瞭解，缺少自信，即是對這本書所代表的文學傳統，缺少研究，一定得出此下策，借用一套方法，否則論文一個字也寫不出來。(「人」頁一八六、七)

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。那些通一法治一書的學者，有如溪邊手持一桿的垂釣者，只要有耐心，總會釣到一條或大或小、或可口或不可口的魚。夏志清這位碧海的鯨鯨手則不然。他是裝備最先進的捕鯨船船長，憑着豐富的知識、閱歷和智慧，在碧海中大顯身手，滿載而歸。方法和理論是批評家的工具，批評家必須靈活操作這些工具，不應反過來受工具的操縱。夏氏深諳此理。

三、通達：思想技巧

並受重視

夏志清博通作品和理論，他的批評標準又怎樣呢？二十多年來，他的標準可說一以貫之。他認為文學作品有好壞高下的分別，換言之，文學批評是帶有評價的，非限於客觀的分析。（因此，他對傅萊 Frye 不作褒貶、只作剖析的那類「批評」家，總覺得彼此格格不入，雖然他也引用傅萊那派的術語。）而文學作品的好壞，決定於思想和技巧——或者說，人生和藝術——兩個因素。文學的思想和技巧並重，文學既為人生亦為藝術，這是老生常談了，是濫調了，但這也是最通達的說法。夏志清在這一方面，並沒有為了求新、求與眾不同，遂捨正路而弗由；遂標奇立異。

「評價小說的標準」一類的文章，夏氏一直沒有寫過，但他評價作品時所用的標準，是明顯可見的。一九五八年寫成的「文學·思想·智慧」一文，指出

為人生與為藝術同等重要，且相輔相成：「忠心於藝術即是忠於作家自己的感性，自己對世界的看法，然後用有組織的文字，表達出他所認為的人生真諦來。」（「愛」頁二三）一九六一年初版的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，不管論的是魯迅、巴金、張愛玲、還是錢鍾書，夏氏都是思想與技巧兼顧的。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「中國古典小說」中，夏志清對小說技巧有非常清楚的闡釋，他採用的是福樓拜和詹穆士相沿下來的現代觀點：

現代的小說讀者，在福樓拜和詹穆士的小說藝術中長大。讀小說時，他要求作者觀點一致；小說的生命觀，由思想精密的作者構造出來，完整而統一；小說具有作者的個人風格，這種風格與作者處理題材的態度互相配合。現代讀者厭惡公然說教、節外生枝、結構鬆散，也厭惡其他種種分散讀者注意力的不智做法。（頁六）

夏氏認為中國傳統的小說，泰半不能符合上述的要求。不過，他沒有因此貶低中國傳統小說的地位，因為他深知我國的小說，從說唱文學發展出來，說書人的時代，與現在相差那麼遠，我們不能以現代的標準，

強加於千百年前的說書人身上。基於這個原因，夏氏放寬了批評的標準，轉移了批評的重心：在評價我國古典小說時，「最首要問的是：這篇作品對人生種種，發掘了有趣的事物和讀者分享嗎？有重要的事物告訴讀者嗎？」（頁十七）這裏「重要的事物」指有思想性、啟發性的事物。賀瑞斯（Horace, 56—8 B. C.）認為文學的好處是有益和有趣，然則夏志清的見解與二千年前賀瑞斯的並無差異了？誠然誠然！作品內容的有益有趣與否，通常憑批評家的常識來判定。當然，批評家的常識，和目不識丁者的常識，不可同日而語；這裏所謂的常識，是有文化教養的人的常識（英文可叫做 the educated common-sense）。孫述宇先生有一篇文章，討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讀法。他說：「傳統批評的基礎不外乎常識，批評家的條件只是知識與閱讀經驗、感受力、和洞察力而已。」孫氏認為批評家讀文學，與常人讀文學，本質上並無分別；批評的目的之一，在「幫助讀者欣賞和了解文學，在文學中找尋各種快樂，找尋人生體驗與意義」。他認為批評中國小說，應該用這種基於常識的方法，而不必「急於試驗各種新奇批評方法」⑦ 夏志清

評價中國古典小說，用的正是這種基於常識的方法。他看了孫氏的文章，自然表示「深有同感」了（「人」頁一八七）。

這裏必須重申一遍：夏志清並不反對試用各種新方法去研究文學；他反對的，只是一味依靠新方法、對作品本身却少加理會那類研究而已。他最近用英文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，指責蒲安迪（Andrew H. Plaks）「紅樓夢的基型和寓言」一書，原因即在蒲氏屬於「方法學至上」的學者，以致往往穿鑿附會，把作品的足削了，去適應理論的履。夏氏在這篇書評中，語氣激昂地說：對蒲氏那本書，他「有極大的保留……『紅樓夢』中那些吸引讀者的人生世相，蒲氏〔竟然〕全部棄而不顧。」⑧

夏氏雖然兼顧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，不過他對人生社會的興趣太濃厚了，因此寫批評時，往往花費很大的篇幅去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（即作品的寫實性和人道精神，這是他最關心的），在藝術技巧方面，有時着墨較少，有人可能會誤解，以為他壓根兒忽視了藝術技巧。「人的文學」一文就這樣說過：「讀中國現代文學，讀到舊社會的悲慘故事，我總不免動容，

文字的好壞反是次要的考慮。只要敘述的是真情實事，不是溫情主義式的杜撰，我總覺得有保存價值，值得後人閱讀回味。」（「人」頁二五一）其實夏氏並沒有改變他思想性與藝術性並重的看法。在「正襟危坐讀小說」一文中，他就針對上述的幾句話，交代清楚自己的一貫主張：

這兩句話可能引起誤解，以為我放棄了小說就是「藝術」的看法，只要敘述「真情實事」就够了。其實這是我退而求其次對「新文學」的看法。五四、三十年代完美的小說實在太少，若僅用藝術觀點去讀它，有些重要的小說家反而得不到公平的評斷。我那兩句的意思是，這些小說，即使當「社會文獻」、「歷史文獻」讀，也仍有其極大的意義。（「新」頁二五一）

夏志清真的沒有放棄小說是藝術的看法，在「（一九七八年）二報小說獎作品選評」一文中，他這樣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：

我們考慮一篇小說的好壞，「文字」、「技巧」、「意義」三位一體，是分不開的。一篇文字、技巧拙劣的小說，談不上有什麼「意義」。

即使作者想表達一個「正確」的意識，他的文字、技巧太差，也會把它寫走樣，把它醜化了。……「老榕」是篇不堪卒讀的小說，……。我認為「冬祭」這一篇寫得很糟，它能選為第二獎，主要是愛國意識很強，主題算是嚴肅的。（「新」頁二七二至四）

他在評選時，力排衆議，無非爲了說明作品只有好的主題而無好的表現技巧，算不得好的作品。

四、通變：匯通衆說

以創新見

夏志清不倚靠新奇的批評方法，去鑽作品的牛角尖。然則他的批評有創見嗎？有，當然有！夏氏有批評家的敏感和洞識力，能見人之所不能見，道人之所不能道。他又博觀中外古今的作品，批評某作品時，經常拿它與別的作品來比較，如此比並觀照，自然容易彰顯該作品的特色。「博觀」是劉勰所強調的，另一個劉勰所重視的概念「通變」，夏志清也具備且實

行了。

通變者，先通於傳統，再求新變；所謂「參伍因革，通變之數也」。通變的道理，和英美現代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的「傳統與個人才華」一文所述的道理相近。劉彥和所謂通變，是就創作而言的。其實，這個概念一樣適用於批評，現在稍加說明一下。假設你要以秋為題材寫一首詩。由於數千年來，以秋為題材的傑作車載斗量，你勢不可能閉上眼睛一揮，就寫出一篇有創意的傑作。你沒有雄心超越前人則已，有雄心的話，就得先盡量閱讀前人以秋為題材的佳構，再憑自己的才智和苦心經營，嘗試寫出與眾不同的名篇。這就是創作上的通變。就批評而言，假設你要以「紅樓夢」為對象，寫一篇批評。由於百多年來「紅學」的論著汗牛充棟，你勢不可能關上書房的門，一下筆就寫出一篇有創見的論文。你沒有雄心超越前人則已，有雄心的話，就得在精讀「紅樓夢」之外，還盡量閱讀「紅學」的重要論文，再憑自己的才智和精思嘗試寫出有新見解的論文。這就是批評上的通變。夏志清之能通變，我們翻開他的書，看到洋洋灑灑識見超卓的正文之後，跟着的是密密麻麻數千百條的附註

，人名書名俱在，中文外文兼收的附註，就知道了。現以「『老殘遊記』新論」一文為例，來說明一下。

劉鶚的「老殘遊記」成於一九〇四年，夏志清的「『老殘遊記』新論」成於一九六八年。六十多年間，這本小說有多種版本和評論。夏志清盡量搜羅各種有關的資料，然後一一閱讀。他所用的版本，有臺北的，也有北京和香港的，連謝迪克(H. Shadick)的英譯本也不放過。評論方面，也兼覽臺北、北京各地的資料，通論性的書如「中國小說史略」和「晚清小說史」自然也看了。他還瀏覽了一大堆涉及「老殘遊記」時代背景的文獻，如「庚子事變文學集」、「庚子國變彈詞」、「清史稿」、「列傳」、「清史列傳」、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」、「清代名人傳略」(英文)、「義和拳大災難」(英文)等等。總之，夏志清所指揮的捕鯨船，有最先進最周詳的裝備，他要在碧海掣捕大鯨。這篇文章果然卓見迭出，確是「新論」。夏氏認為「老殘遊記」是我國第一本用第一人稱寫的抒情小說，也是我國的第一本政治小說，非普通人所稱之諷刺小說、譴責小說而已。夏氏又認為，老殘于銀光映雪中矯首對月一節，固屬佳構，這節

接下來的沈思一段，更應受注意。這裏劉鶚深入主角內心，顯出抒情家的真正本領。在歷代小說中，這樣的技巧，誠然憂憂獨造。（「文」頁七〇、七九）

順便提一下，「中國古典小說」於一九六八年出版，「新論」一文則成於同年冬天。夏志清先生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，已得到長俸，兩本大書（另一本是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）又已先後出版，這時本該休息休息，輕鬆一下了。可是不然。他讀書永不停息，研究和寫作也永不停息。一九六八年，他除了「新論」之外，還寫了好幾篇序和書評。「新論」一文提到 Frank Kermode 的 *The Sense of an Ending: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*，是一九六七年才出版的英國書。上面說夏氏從來沒有和文學界脫節，這是一例證。（還有一事也要順便提一下，就是「新論」一文原題為「『老殘遊記』的藝術成就和政治意義」，是夏氏兼重藝術與思想的又一說明。）

五、「小說史」：史的透視

夏志清通識古今文學名著，持論通達，批評時又融匯各家說法以求通變，加上脫俗的才智，辛勤的努力，他所寫的批評，自然精警卓越，為士林所推崇了。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(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)於五〇年代末期成書，此書一鳴驚人，為他贏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席，更奠定了他那學者批評家 (scholar-critic) 的權威地位。這本書於一九六一年出版後，好評如潮，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者所必讀。劉紹銘先生在此書中譯本引言中，提到一些書評，顯示「連政治上與他〔夏氏〕意見相左的年青學者，也對他的學問和批評眼光表示佩服」。劉紹銘本人譽此書為「經典之作」，劉若愚先生則謂此書乃「不朽的傑作」(monumental)⑨。筆者由頭到尾校讀過此書三次，深深覺得一切的讚譽，毫不誇張。夏氏這部經典之作，既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歷史，也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實際批評，也可視為比較文學的論著。

夏著上起文學革命，下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論述了五十年來我國小說的時代文化政治背景，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；重要的文學派別和文學論爭，也都顧及

了。文學史家力求客觀公允的態度，夏志清自然具備。既能如此，他對左派作家的成就，並不抹殺。只要作者不蔽着良心說話，只要作品「敘述的是真情實事，不是溫情主義式的杜撰」，夏志清都重視，都予以公允的評價。他透視這數十年的文學歷史，發現中國現代文學（不限于小說）思想上最大的特色，是感時憂國的精神，這種精神貫串着幾十年來無數的作品——從魯迅、沈從文、老舍到楊朔等人的作品。（夏氏又認為姜貴、余光中、白先勇等臺灣作家的作品，也充滿這種感時憂國的精神。）夏氏這樣解釋：

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長期的喪權辱國，當政者的積弱無能，遂帶來歷史上中華民族的新覺醒。作家和一些先知先覺的人物，他們所無時或忘的不僅是內憂外患、政府無能；不管中國的國際地位如何低落，在他們看來，那些紛至沓來的國耻也暴露了國內道德淪亡，罔顧人性尊嚴，不理人民死活的情景。……現代的中國作家，……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，無情地刻畫國內的黑暗和腐敗。（頁二五九至六一）

夏氏認為我國的現代文學，隱然含有「對民主政制和

科學的嚮往」，這一特色，和西方的現代文學很不相同。因為西方現代文學作家，如杜斯妥也夫斯基、康拉德，「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」，甚至對文明本身抱着「沉痛的仇視態度」，寫出來的，很多都是「充滿虛無主義、非理性的文學作品」（頁二六一）。

六、「小說史」：

評價公允景從者衆

這本「小說史」，也是一本中國現代小說的實際批評。錢鍾書先生讀過此書後，在致夏氏的信中稱讚道：「尊著早拜讀，文筆之雅，識力之定，迥異點鬼簿、戶口冊之倫，足以開拓心胸，澡雪精神，不特名世，亦必傳世。」^⑩私人書信，往往有客套恭維的話。不過，夏氏此書，當得起這樣的恭維而無愧。坊間多的是「點鬼簿、戶口冊」一類的現代文學史。編寫的人，只羅列一堆可靠或不可靠的資料，對作品根本不大不了，即使談到作品，也是三言兩語，說說粗淺

的印象就了事。夏志清則不然，他精讀過要批評的作品，憑他的通識、通達、通變，自然寫出第一流的批評文章：有深入的分析，有廣泛的比較，有公允的評價。

批評家最得意的事，莫過於大筆一揮，說什麼作品「最」佳，哪個作家「最」偉大了。可是，這個「最」字要下得合理、下得令人折服、下得一言九鼎，却是天下最難的事之一。這個字下得不好，會使批評家信譽掃地，落得個失意的下場。夏著的「最」字下得很多：「『虹』是矛盾……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本」（頁一二六）；「『駱駝祥子』是中日戰爭前……最佳現代中國長篇小說」（頁一五八）；沈從文是「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最傑出的、想像力最豐富的作家」（頁一六五）；「『長河』是沈從文較長作品中最佳的一本」（頁三〇九）；張愛玲的「金鎖記」是「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」（頁三四三）；鍾錢書的「圍城」是中國現代文學中「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，可能也是最偉大的一部」（頁三八〇）；等等。

迄今為止，筆者還沒有看到夏志清那一大串「最

「什麼「最」什麼的評語，遭受任何的反駁。反過來說，他的論調得到熱烈的響應。例如，他極力推崇的作家像張愛玲和錢鍾書，都因夏著之出現而備受中外學者和批評家重視。論張、錢的專書或者博士論文，在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之後，紛紛面世，錢的「圍城」英譯本且快要出版了^①。巴金的「家」在三〇年代轟動一時，極受青年讀者歡迎。然而夏志清認為巴金四〇年代完成的「寒夜」，「掘發人性」、「植根于日常生活」、富于「心理寫實」，是巴金的「優秀」「成熟」之作，比「家」好得多。「寒夜」近年已由茅國權先生英譯行世。夏志清抑「家」崇「寒夜」的做法，還得到其他的支持。名小說家白先勇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講中說：「巴金經抗日戰爭的洗禮後，人生觀及文字風格都開始變得成熟收斂，他抗戰時期的長篇小說『寒夜』，在藝術成就上，要比『家』高得多。雖然兩本小說都是討論家庭倫理的問題，『寒夜』缺少『家』裏面的革命意識，但小說中的人物刻劃，要比『家』細緻真實得多。」^②引文中「成熟」、「真實」等意思，和夏氏的完全一樣。白先勇也跟夏志清一樣，非常推重張愛玲的小說。白氏此文引了夏氏

不少見解，迴響着夏著小說史的基本語調。

艾略特認為批評家的一項任務，是改變讀者品評的口味。不少人談論中國現代文學，以淺薄為純樸，以濫情為多情，不能分辨文字的高下優劣，不能認清真實與假象，更有不少人一味強調社會意識和政治教條。夏志清要改變的是這些口味。他認為成功的作品，必須深刻而生動地呈現人生世相複雜多面的真實；成功的作品，還必須有圓熟的技巧和文字。得到夏氏稱許的作品，如上面提到的「寒夜」、「金鎖記」、「圍城」等，都符合這些條件。從前面所述看來，夏氏的「小說史」產生了深遠而良好的影響，改變了很多讀者的口味^⑬。「小說史」的中譯本數月前出版了，此後的影響當會更大。

夏著對衆多作家和作品重新評價了，不過他的再評價並非為新而新，他的再評價也沒有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所左右。例如，中共的新文學史家王瑤和劉綏松，都十分推崇矛盾的「子夜」。王說它是三〇年代的「重大收穫」，劉說它是「本時期新文學最重要的收穫」^⑭。夏志清知道這些好評，但並不因此而唱反調。他認為這本長篇小說「很具氣勢，不愧為自然主義

中的力作」（頁一二〇），雖然他以為茅盾寫得最好的是「虹」。毛澤東極力讚揚魯迅，說他是「偉大的文學家」，是「空前的民族英雄」；在所有的中國現代作家中，魯迅的地位，在中國大陸上，始終最為崇高。中共把魯迅捧上青天，夏志清沒有因此而把他貶入地獄。夏氏對魯迅的雜文有不滿之處，說他寫雜文時，「可以不顧邏輯和事實，而無情地打擊他的敵人，證明自己永遠是對的」（頁四二）；又指出著名的「阿Q正傳」，就藝術價值而論，「顯然受到過譽：它的結構很機械，格調也近似插科打諢」（頁三三）。可是，夏氏非常坦率地表示欣賞魯迅的短篇小說如「狂人日記」、「孔乙己」、「藥」、「祝福」、「在酒樓上」、「肥皂」；屢用「相當出色的技巧」、「動人」、「見功力」、「深刻」、「精彩」（頁三一至三七）等字眼來形容；總括的評語則為：這幾篇小說「是新文學初期的最佳作品，也使魯迅的聲望高於同期的小說家」（頁三九）。

七、「小說史」：

比較研究及其他

前面說過，夏志清不倚靠新奇的批評方法，在判別作品高下時，也不故意唱反調，不嘩衆取寵。他對作品的評論，精闢之處固然很多，有些地方則可能和你和我一樣，因為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的情形很普遍。好像他論及魯迅的「孔乙己」時，說這是「一個破落書生淪爲小偷的簡單而動人的故事」（頁三一）；論及「在酒樓上」時，說這是作者「徬徨無着的衷心自白」（頁三七）。這些都是平實的意見，你我都可以說出來。不過，夏志清這位博大的批評家，的確不同凡響。接着上引的評語之後，夏氏繼續說：「孔乙己」的「簡鍊之處，頗有海明威早期尼克·亞當斯（Nick Adams）故事的特色」；魯迅「在酒樓上」所流露的心情，「和阿諾德一樣：『徬徨於兩個世界，一個已死，另一個却無力出生』」。此外，夏氏還說，我們可以把魯迅那些寫得「最好的小說與」詹姆斯·喬艾斯的「『都柏林人』互相比較」（頁三〇）。這些話就絕對不是泛泛的讀者能够說出來的了。

「片面的認識不可靠」這句話一般人都會說。但蘇軾寫文章，直白說明這個道理之外，還輔之以扣盤

捫燭的比喻，使道理說得更清楚，更生動有趣。文豪之爲文豪，之與平庸的寫作人不同，就在這裏。創作中用比喻，相當於在批評中，把甲作品拿來與乙作品比較。大抵創作中用比喻，七分靠聯想力，三分靠學問；批評中作比較，則七分靠學問，三分靠聯想力。比喻法和比較法，除了使人更加明白道理之外，還使人佩服作者的學問和聯想力。夏志清使人佩服的、卓然高於一般寫文學批評者的一個地方，是用比較法。

就此而言，這本書可視爲一部比較文學的論者。魯迅的「故鄉」、「在酒樓上」、「祝福」等小說，是他二度回故鄉浙江紹興後寫的，大可以「紹興人」做總題目。夏志清說得對，這些作品不妨拿來與喬艾斯的「都柏林人」（*The Dubliners*）比較。我們又可以照夏先生的提示，在文字風格上，比較「孔乙己」和海明威的尼克·亞當斯故事。（「藥」一篇用的是旁知觀點，極爲客觀冷靜，在敘事手法上，筆者認爲大可與海明威的「殺人者」*The Killers* 比一比。）夏志清又把魯迅和阿諾德相題並論，筆者認爲這兩個人也是很好的比較題目。阿諾德的時代，宗教文化式微，科學文化抬頭；魯迅則生當我國傳統文

化與現代文化衝突的時代。英國和中國這兩個知識分子頗有相同之處：「二人都生於書香世家」，都是文化的批評者，都在思想上經過困惑迷惘的階段。二人都既寫評論，又寫創作，在其創作中把困惑的思想表現得很清楚：安諾德筆下的 Empedocles 抑鬱倦怠 (depression and ennui)，這和「祝福」、「在酒樓上」中的「我」（其實就是魯迅本人），豈非貌合神合？夏志清在「小說史」中，對安諾德和魯迅輕輕一筆，點到即止，而這已是一篇博士論文的大好題材了。

書內此類中外比較的例子，俯拾即是。夏氏說，茅盾「子夜」的主角，近乎自然主義小說家如左拉筆下的人物（頁一三三）；其「追求」則「使人不禁想起英國女小說家喬治·艾略特的小說『密得馬區』」（頁一二五），在人物性格和關係方面，巴金的「憩園」和「寒夜」，分別與羅倫斯的「兒子和情人」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白痴」有相通之處（頁三二四、三二七）。吳組細「官官的補品」的諷刺手法，屬於英國諷刺作家史威夫特所用那一類（頁二四四）。張愛玲「秧歌」的「樸素寫實的筆法，足和喬治·艾略

特的『河上磨坊』相比」（頁三六〇）。夏志清又認為沈從文的小說世界分為兩邊：「一邊是露西（Lucy）型態的少女如三三、翠翠」，另一邊則為「華茨華斯（Wordsworth）的第二種人物：飽歷風霜、超然物外，已不為喜怒哀樂所動的老頭子」（頁一七一頁）；沈從文「生」這篇小說中的老頭子，「孤寂之中帶有一種偉大，如華茨華斯兩首名詩裏的老人邁格爾和撈水蛭者一樣」（頁一七三）。華、沈二人的作品都富田園風味，這裏的比較精彩極了。

華茨華斯詩的中譯不多，沈從文又不諳外文，不可能讀過華詩而受其影響。這裏華、沈的比較，用比較文學的術語來說，是類比研究（analogy study）。上面提到的茅盾、巴金等的比較，基本上也屬於這種。另一種比較文學研究，則名為影響研究，「小說史」中這一種的例子也很多：郁達夫在日本補習學校就讀期間，看了差不多一千種歐洲和日本的小說；他的「沉淪」受了日本和歐洲頹廢作家的影響（頁五八八）。「老舍對狄更斯極為喜愛，不久就模仿他寫了一本滑稽小說『老張的哲學』」（頁一四二）。錢鍾書精通英國詩歌，他的小說「靈感」顯然受到特萊頓

(Dryden)「麥克·佛萊克諾」、蒲伯(Pope)「愚人史詩」和拜倫「審判的幻景」的影響(頁三七五)。

書內中西相比的地方太多了，上面不過略為舉例而已。在「追念錢鍾書先生」(一九七六年)一文裏面，夏志清這樣說：「我十年前對比較文學也很感興趣，現在讀書較多，反而膽子變小，覺得自己實在沒有資格充任比較文學家，同時覺得大半有比較文學味道的中國文學論文，不免多少帶些賣野人頭的性質。」(「人」頁一八八)生也有涯，知也無涯，愈博學的人，愈有這個感覺。比較文學是一門無窮無盡的大學問，面對它，任誰也會有河伯望洋之嘆。從事比較文學的人，都應該知道他做的是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事，我們希望博學的夏先生，既然做了比較文學的一個開路先鋒，就不要輕言退縮了。對我國而言，比較文學的最低層次，是借用外國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。高一點的層次則是中外作品的類比或影響研究；層次的高低，與研究範圍和規模的大小，成正比例。環顧我國學界，能在高層次研究比較文學的人，寥寥可數。夏志清這位高人，能拂袖下山而去嗎？

「小說史」是空前的大著，初版面世至今十九年，一直後無來者。夏氏精讀了千百本我國現代小說，英文譯本的作品，如老舍的「駱駝祥子」、蕭軍的「八月的鄉村」、楊朔的「三千里江山」，夏氏連這些英譯本也讀了。不要說學問和見解，只說這樣的功夫和魄力，就非常人所能及。夏著規模如此宏大，照顧如此全面，但也有遺漏。在四〇年代有成就的作家如艾蕪、路翎、沙汀、端木蕻良，夏著或一筆提過，或只作短論，都使小說史的讀者有不足之感。夏氏自己也知道這方面的不足，且引以為憾^⑤。大概他撰寫「小說史」時，這些小說家的作品搜羅不到，以致評無可評。徐訏、無名氏、鹿橋等，在四〇年代都有作品行世，有的且非常多產。「小說史」沒有討論到他們，這也是遺漏。此外，沈從文的「邊城」，向有好評，論者以為此書頗能代表沈氏的風格。夏著只輕輕提了四、五筆，未作專論。諸如此類，若干「小說史」的讀者，當有不過癮的感覺。

「小說史」初版後七年，夏氏出版了另一大書「中國古典小說」。如果他研究的次序顛倒過來，即先「中國古典小說」，後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，則他在

評論現代作品時，當更能大量援引古典小說，以看出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和異同，這樣一來，夏氏在評論現代中國小說時，除了徵引西方作品以爲比較之外，無疑又多了一面鏡子。

八、「中國古典小說」及

其他

「中國古典小說」(*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: A Critical Introduction*)於一九六八年出版，評論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金瓶梅」、「儒林外史」、「紅樓夢」六本歷來爲人稱道的長篇小說。這本書沒有對我國古典小說作全面而詳盡的歷史性探討，所以不稱爲「中國古典小說史」。不過，第一章是長達三十三頁的導言，概論了我國傳統小說形式上和內容上的特點。夏志清的文章，向來不喜歡分小節、每節加小標題。這裏筆者嘗試把這篇長文分成若干小節，並撮述每節的大意。這本書原爲英文，全書的中譯本尚未面世。以下的撮要

和引錄，都是筆者根據英文原著譯述過來的。

導言第一節由第一頁至第六頁，歷敘五四運動胡適以來，國人對古典小說評價的起伏不定，兼釋古典一詞的用法。

第二節由第六頁第二段至第十七頁，析論古典小說的語言特色，探討其與說唱文學的關係。這一節並描述西方現代小說的特徵（本文前面引述過，茲不贅），然後指出，西方現代評價小說的標準，不必強加於我國古典小說上面。夏氏又說綫段式結構（episodic structure），也就是一段插曲接着一段插曲，而其間並無必然關係這種結構，是古典小說的一大特色。

第三節由第十七頁第二段至第二十頁，探討西方寫實主義一詞，能否用來描述中國古典小說。

第四節最長，由第二十頁第二段至導言結束處，討論我國古典小說的思想。夏氏認爲儒釋道三家思想都存在，不過，有些小說融合了各家思想，不易歸類。夏氏指出，古典小說充滿種種神奇怪異的事物，連低級趣味的也包括在內；總之，好人壞人，善事惡事，美的醜的，大千世界的全部（“the whole truth”

），一網打盡。夏志清又說，儒家主張中庸之道，但小說中的人物則慾望無窮，聲色犬馬，榮華富貴，拼命追求。講故事的人，喜歡述說流芳百世的英雄和遺臭萬年的壞蛋，這頗能顯示「他們小說藝術的幼稚和聽衆的天真：一旦剔掉聾人聽聞的事件，他們就沒有故事可說了」。夏氏還討論了古典小說的道德意識、社會正義、因果報應、人生觀、角色類型等問題。最後夏氏指出，縱使他所評論的這六本小說，藝術成就有高下之別；它們在反映和探討人生世相時，表現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洞悉精微的識見，與西方傳統的偉大小說並無二致。

已故的美國漢學家比索(John Bishop)，對中國傳統小說的鬆散、綴段式結構，以及怪力亂神的色彩，頗有微詞^⑤。夏志清並不諱言這些特色（或者說缺點），但他從我國小說的發展背景去分析這些現象，而且能够欣賞我國小說其他方面的長處，這才是持平之論。

夏志清寫批評前，一貫的做法是精讀作品，並遍覽該作品的有關資料，融滙貫通之後才下筆，批評時則多方引證比較。「中國古典小說」第一章導言之後

，有六章，每章評論一本小說，每章寫法莫不如此。其體例則爲：每章於開始處扼要說明該小說的特色和版本，跟着從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兩方面來評析，又每每選擇小說中精彩的情節，詳予討論。此書末附索引，每本小說的評論重點，索引中一一列出。現在根據索引，分述各章重點如后。

第二章論「三國演義」：歷史小說；赤壁之戰；與水滸傳的比較。

第三章論「水滸傳」：作者和版本問題；小說與史實；虛構部份的成就；英雄約法，理想的友誼；喜劇性場面；幫會意識；描述性段落；野蠻與虐待狂；對婦女的態度；中共對本書的讚揚；夢與神秘經驗；詩詞段落。

第四章「西遊記」：版本；詩詞段落；對「心經」的哲學性評解；結構的複雜性；神話性意義；佛教喜劇；四種誘惑。

第五章論「金瓶梅」：譯本；中國小說發展的里程碑；作者和版本問題；書中借來的歌和故事；內容提要；前後矛盾對寫實可信性的影響；道德觀和宗教觀；佛家和佛家思想；色情描寫；道德的寫實主義；

對「紅樓夢」的影響。

第六章論「儒林外史」：風格和技巧的革新、持久的影響；版本；一串關連的故事；景物描寫和性格刻畫；十八世紀社會風尚的紀錄。

第七章論「紅樓夢」：最偉大的中國小說；手稿和早期的原文；統一性；評註本；重要角色和情節；和「金瓶梅」的比較；小說裏的情與慾；中國人對書中主角的溫情；黛玉的夢；詩酒之會；香囊事件；寶玉的夢；悲劇性，以及譏諷性喜劇的調子。

夏志清最推崇「紅樓夢」，說它是古今「所有中國小說中最偉大的」；清末民初的小說，吸收了西方的技巧，「可是，即使是最好的現代小說，其深度與廣度都無法和『紅樓夢』的相比；除了少數例外者，現代中國的小說家，雖有各種新技巧供他運用，却在往像傳統小說家一樣，缺乏哲學的雄心，沒有辦法探索深一層的內心真相」（頁二四五）。夏氏又說：「就社會寫實與心理刻畫而言，『紅樓夢』可與西方傳統最偉大的小說並列。」（頁十七）

「中國古典小說」一書之外，夏志清在「戰爭小說初論」一文裏討論了「封神演義」、「說唐前傳」

、「說唐後傳」、「說唐征西三傳」、「楊家將」、「國花樓」、「五虎平西」、「五虎平南」等多部小說。此外，他還有專文論「隋史遺文」、「鏡花緣」和「老殘遊記」。後二者由筆者把原著譯成中文，夏氏之博學卓識，又一次令人感到佩服不已。根據英文刊物「中國文學」（*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Reviews*）最近的預告，夏氏論「玉梨魂」的新著（*Yü-li hun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 in China*）將於不久後發表。在我國古典戲劇方面，夏氏也有兩篇論文：「熊譯『西廂記』新序」、「湯顯祖筆下的時間與人生」。

九、當代作品評論

這裏說的當代作品指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以外的當代作品。夏志清有專文評論於梨華、白先勇、金溟若、陳若曦和若干年輕作家的作品，吳魯芹、余光中、和琦君的詩文。他還為多本評論集如「林以亮詩話」、何懷碩「域外郵稿」等作序，又寫了好幾篇悼文，在這些文章中談文說藝。最近，夏氏又發表專文

數篇，同顧了胡適、陳衡哲、許地山、顧一樵這些五四時期的作家和作品。

夏志清已故的哥哥夏濟安先生於一九五六年，在北創辦了「文學雜誌」。大約從這個時候起，夏志清經常在這本雜誌上閱讀臺灣作家的作品。一九六六年夏氏為於梨華的「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」作序，序中說他十年前讀到「文學雜誌」上於氏的作品，已注意其人了（這時他也注意到白先勇）。他在序裏面說：「臺灣的作家是相當寂寞的，倒不是他們沒有讀者，而是沒有書評人關心他們作品的好壞，不斷督策他們，鼓勵他們。」（「文」頁一四三）書評人當然並非一個也沒有，只是嚴肅而有份量的書評確實太少了。因此，夏志清替於梨華的小說寫序，後來又撰長文論白先勇的小說，可說基於一種使命感：建立嚴肅批評的風氣，衡量當前文壇的成就。

夏氏說於梨華的小說，文句常翻花樣，又「善於複製感官的印象」，而多情善感是於氏小說中人物的特質。至於「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」這個小說本身，故事雖簡單，但是「引人入勝、富於戲劇性」。於氏較早期寫的作品，則喜以意外作結，相當俗套。批評

時，夏氏施展其看家本領，徵引西方現代諸大師的作品，以為試金石。

「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」成於一九六九年，這時，他已讀了白氏的小說足足有十年之久。序「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」時，夏氏已說白氏在「現代文學」發表的小說，「篇篇紮實，尤其是最近發表的幾篇」。如今夏氏重讀了白先勇的二十多篇作品，「更肯定了我四五年來一向有的感覺：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。……那七篇總名『臺北人』的小說，篇篇結構精緻，文字洗鍊，人物生動，觀察深入，奠定了白先勇今日衆口交譽的地位。」（「文」頁一六三、四）夏氏又指出小說中的「歷史感」，認為「臺北人」可以說是部民國史」。夏志清是最早肯定白氏成就的批評家之一，其論點之確當，毫無疑問。在這篇論文中，夏氏又分析了「玉卿嫂」等小說中的性愛。其博學卓識，令人折服；夏氏對心理分析這門批評學說之熟習，也顯示了出來。

一九七二年，夏志清在美國耶魯大學宣讀論文，介紹近二十年來臺灣在文學上的成就，他學要評介了姜貴、余光中和白先勇。夏氏力崇余光中的散文，謂

其「鬼雨」一篇，「比諸中國文學史上任何聞名的悼文祭文，敢誇毫不遜色」；更謂「余光中是當代最有獨創性、最多姿多采的散文家」。夏志清指出余氏的作品，充滿了國懷與鄉愁，並以「敲打樂」和「蒲公英的歲月」一詩一文為說明。余氏的詩文，筆者全部讀過，覺得他的作品精新鬱趣，博麗豪雄，自然深深同意夏志清的看法。

陳若曦在一九七四年發表「尹縣長」這篇小說，備受中外人士注目。夏志清於一九七六年為陳氏小說集作序，暢論她的小說。夏氏從她早期的作品如「最後夜戲」一直論到近期的，指出早期象徵性渲染和近期冷靜寫實的不同，但其「深厚而不浮誇的同情心」則一。陳若曦的「尹縣長」、「任秀蘭」等小說，寫出了整個大陸社會的悲慘和荒謬，夏氏藉着對這些小說的評述，表示了他人道主義者的憤慨和同情。我國現代的作品，夏志清愈讀得多，愈覺得寫實主義和人道精神的可貴，這是在「人的文學」所說過的，也是他自覺最近這幾年的看法，和二十年前他準備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時的看法，略有改變之處。因為他重視寫實和人造，「正襟危坐讀小說」一文（一九七七

年）乃有這樣的話：「有些鄉土小說家，憑他們良心的驅使和實地的考察，僅寫關注臺灣地區貧民實況的作品，雖然他們所揭發的苦痛比起大陸的黑暗來，微不足道，也是同樣值得我們珍惜的。」（「新」頁二四八）不過，在另一篇小說獎評判報告中，他警告青年作者：愛國意識強、主題嚴肅的作品，不一定是好作品；藝術技巧和創作誠意的重要性，絕不下於主題意識的（「新」頁二七四等）。上面筆者說，夏氏的批評標準，思想與技巧並重，是一以貫之的。夏志清的確如此。在近年大型小說獎作者中，夏志清最為欣賞蔣曉雲，謂其文筆細緻、技巧圓熟（「新」頁二六一）。蔣之成功，同陳若曦之成功一樣，都在於質文能够兼顧。

夏氏「陳若曦的小說」一文開始時，記述一九六二年大除夕，夏氏、陳若曦、叢甦等在紐約吃晚飯、逛格林尼治村，「在小咖啡館坐坐，最後鼓足勇氣，進了一家小型夜總會。生平第一次同兩個女孩子守歲……，特別值得紀念。」（「新」頁二一〇）這段文字和全文的題旨，並無關連，何以夏志清這樣寫下來，且沒有在自己修飾文章輯印成書時刪掉？原來這是夏

氏近年來寫文章的一個特色，就是於評論中兼述自己的生活，也就是在論文中寫傳記。余光中寫過多篇「自傳式的抒情散文」；夏志清這類文章，大可名爲「自傳式的抒情論文」。學院派的批評文章，本應客觀、冷靜、無我。夏志清這個性情中人，寫過兩大本英文大著後，乃還我本來面目，任性情之所之，寫起自傳式的抒情論文來。夏氏這些文章，提供了大量傳記資料，給以後替他寫傳的人極大方便。

夏志清在文章裏流露的感情，有手足之情，也有朋友之情。他兄長夏濟安的逝世，使他感到生命一片空虛，自此之後，他常常在文章中提到其先兄，縷述他們在學問、寫作、愛情各方面，如何互相勉勵。他也篤於友情。朋友請他寫序，他必定仔細閱讀朋友的作品，然後認真地執筆，因此往往有精見。好像他爲「林以亮詩話」作序，就借此機會，泛論了中國現代詩壇的一些現象，又指出詩的教育在今日的重要。朋友去世了，他爲文追悼。他一向樂道人之善，對亡友的道德文章，多所褒揚。例如，陳世驥去世了，他在悼文中，述介陳氏的論著，肯定其學術上的成就。不過，遇到自己不能苟同的地方，夏氏坦率地指出來。

陳世驥對杜甫「八陣圖」的評價極高，認爲此詩在氣勢上，簡直可以同古希臘悲劇相頡頏。夏志清則認爲，「一首四行的詩，無論如何是不能同阿斯基勒斯的悲劇同日而語的」（「文」頁二二五）。夏氏一本批評家客觀的態度，也不諱言亡友的缺點；陳氏的文章雖好，「但有時文章華過於實，意思交代不清楚，這是他的毛病」（「文」頁二二七）。

夏氏對晚輩朋友的熱情，他的扶掖後進，早出了名。劉紹銘的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編譯者序就提過這一點。在紐約立雪夏門的生徒之外，他還有很多私淑弟子和欽佩他的後輩。夏志清不算是十分多產的作家，之所以如此，筆者猜想其中一個原因，是他給朋友寫信寫得極多（我不敢說太多），耗了不少時間。將來他要出全集，而全集又包括書信的話，這些書信一定十分可觀。不但份量可觀，信中談文論藝的意見，也一定可觀。

夏志清是性情中人，常常坦率表示自己的看法。他對我國古典和現代小說，有褒有貶，這點上面已說過。對中國的詩亦然，他說：「假如有人要我將中國詩和喬叟以來六百年英國詩相比，那末我祇能憑我自

己的經驗，說我更偏愛英國詩，不管中詩有多少特點，爲英詩所無法兼有。」（「人」頁一九一；夏氏早期專攻英詩，博士論文以英國詩人 George Crabbe 爲題材，他對中英詩的比較，自有份量。）夏氏絕不

因爲自己在外國教授中國文學，就賣花讚花香，把中國文學捧到半天高，說成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文學。中國現代文學是他多年來研究的範圍，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，他爲「中國時報」寫了一篇「五四雜感」。一般人都毫無保留地讚美五四愛國運動，夏志清從五四運動想到今日的學生運動，認爲學生運動對一個國家執好執壞，「值得我們深思」。他肯定地說，「五四運動出於學生羣自發的愛國心」，但他擔心很多其他學生運動變了質，受政客利用。他對近年來伊朗學生的遊行示威，「感慨萬千」；「一個專暴頑固的宗教領袖〔柯梅尼〕從巴黎返國後，得意橫行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人權掃地，不出兩三年，伊朗必然變成蘇聯的附庸。」（以上引文見「新」頁六一至六九。）「五四雜感」寫成後七個月，伊朗學生在柯梅尼的默許（或者指使）下，佔領美國駐伊大使館，劫持人質，直至翌年一月初，即筆者寫此文時，人質尚未獲釋。此

事引起了舉世對伊朗專政者的憤怒和譴責。好些學生運動，內裏比表面複雜得多，對國家社會執好執壞，的確「值得我們深思」。

十、文學博「士」

夏志清談中國五四的學生運動，又談伊朗今日的學生運動，那末，他的言論，已越出文學批評家的言論範圍了？我們可以這樣說，也不可以這樣說。可以這樣說，因爲文學批評是對文學作品的批評，而不是對時局世事的批評。不可以這樣說，因爲文學的天地極廣極大，一切人生世相莫不包涵，文學和整個人類文化息息相關。夏志清論文學，人生與藝術兩方面並重，而往往更注重人生這一面，富人道主義者的精神，這些上面已分析甚詳。就此而言，夏氏之批評時局文化，是順理成章的事。英國的批評家中，十九世紀的安諾德，二十世紀的艾略特，於批評文學之外，還批評文化。夏志清沒有寫過專論文化或時局的重頭文章，但他的文學批評著述中，常常表示他對文化和世局的關心。例如，一九七三年寫文論「鏡花緣」，題

目是「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」；一九七六年又撰文介紹巴順(Jacques Barzun)的史學，談的是文化世局的問題。很多年前，法國作家沙特聲稱知識分子必須關心國家社會、人類文化。這和我國傳統對士的看法是一致的：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。」夏志清具有士（或知識分子）的風範。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完稿的「追念錢鍾書先生」一文這樣說：「前兩三年，宋淇來信說吳興華已死了，而且死得很慘。……我讀了宋淇的信，悲從中來」，為有才華的作家、學人被迫害而沉痛地抗議（「人」頁一七八、九）。

當然，夏志清最關心的，還是文學本身的事。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。」夏氏在「人的文學」一文中，表現了他視寫實與人道更重於藝術技巧的傾向。這一傾向，加上剛才所說的，又使他符合了「先器識而後文藝」的士的形象。

他最關心的，是文學；成就最大的，也在文學——是本文所析論的文學批評。夏志清無疑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，極端重要的批評家。論博學、論見識、論批評規模之大、論影響之巨、論對當代文壇之關注

，這些條件加起來一同考慮，現代的批評家中，筆者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和他媲美。夏先生現已白髮斑斑，數月前接受「聯合報」訪問時說：近年實行素食，以求延年益壽，多寫幾本好書^①。他的計畫之一是撰寫抗日期間小說史。這是士的精神的又一表現：弘毅而自強不息，獻身於文學批評這任重道遠的工作。夏志清先生是「博」士，且是博「士」，是真正的文學博士。

——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完稿——

附註

① 本文所據的是香港友聯版的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中譯本。下文引述的「中國古典小說」，則為英文原著。夏志清的中文論文集，共有四本，計為：「愛情·社會·小說」（臺北，純文學，一九七〇），「文學的前途」（同上，一九七四），「人的文學」（同上，一九七七），「新文學的傳統」（臺北，時報文化，一九七七），在本文中，分別簡稱為「愛」、「文」、「人」、「新」；下文註明頁數時，悉用各

書的簡稱。

② 成於一九五八年的「文學・思想・智慧」一文說：「往事追憶錄」他只讀過小半部，「源氏物語」他正在讀英譯本（見「愛」頁二〇）。到後來夏氏寫「中國古典小說」時，此二名著應已讀畢。

③ 余光中，「左手的繆思」（臺北，文星，一九六四），頁一六〇。

④ 轉引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「明報」的「秦牧埋首創作兒童文學」一文。

⑤ 這個年份根據的是 *Renditions* no. 2 (Spring, 1974) 裏面「作者簡介」的資料。據「重會錢鍾書紀實」一文資料推算，則夏氏應生於一九二〇年。筆者曾去信夏氏，詢其出生年份，但未獲答覆。

⑥ 見「臺灣時報」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、八日潘秀玲「夏志清與青年朋友談文學批評」一文下篇。

⑦ 孫氏見解，轉引自夏氏「追念錢鍾書」一文，見「文」頁一八六、七。

⑧ 見夏氏評 *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* (Princeton, 1976) 一文，書評刊於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*

Studies (1979)，頁一九一。

⑨ James J. Y. Liu, "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: Recent Developments, Current Trends, Future Prospects,"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35: 1 (Nov., 1975), 頁二五。

⑩ 引自氏「重會錢鍾書紀實」一文，見「新」頁三五。

⑪ 水晶的「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」（臺北，大地，一九七三）認為「金鎖記」最好，但他不評，因為夏志清已經評了，大有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」之概。至於錢鍾書作品之翻譯及研究，可參看王潤華，「深一層看潛伏在『圍城』裏的象徵」一文（收入王著「中西文學關係研究」，臺北，東大，一九七八）。

⑫ 白先勇，「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」，刊於「明報月刊」一九七九年十月號，頁七六。

⑬ 劉紹銘編譯的「中國現代短篇中篇小說選：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」（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），選的六十多篇作品，極大多數都曾獲夏氏好評。

這些作品包括許地山的「玉官」、吳組綸的「官官的補品」、張愛玲的「金鎖記」等等。

⑭王瑤，「中國新文學史稿」（上海，新文藝，一九五三），頁二二七；劉綏松，「中國新文學史初稿」（北京，作家，一九五六），頁三四九。

⑮「小說史」作者中譯本序，頁一八。

⑯John Bishop, "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," *Far Eastern Quarterly* 15: 2 (Feb, 1956).

⑰丘彥明，「夏志清先生回來了」，刊於「聯合報」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一日。

附錄：夏志清中英文著述目錄初編

到一九七九年為止，夏志清編著了中英文書共十本，另外還有未結集的論文多篇。十本書是：

1. Coauthor with Lucian Pye and others. *China: An Area Manual*. Vols. 1-2. Edited by D. N. Rowe & W. Kendall.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, Operations Research

Office, 1954.

2. 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.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1; 2nd enlarged edition, 1971. 此書簡介見下面乙部。

3. *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: A Critical Introduction*.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8. 此書簡介見下面甲部。

4. 「愛情，社會，小說」，臺北，純文學，一九七〇。共收論文十篇，凡二五七頁。

5. Editor & co-translator. *Twentieth-Century Chinese Stories*. Joseph S. M. Lau, assistant editor.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71.

6. 「文學的前途」，臺北，純文學，一九七四。共收論文十三篇。凡二四五頁。

7. 編註「夏濟安日記」，臺北，言心，一九七五。

8. 「人的文學」，臺北，純文學，一九七七。共收論文十二篇，凡二四八頁。

9. 「中國現代化小說史」，臺北，傳記文學，一九七九。

另有香港友聯版，同年出版。本書爲上面所列第二本書之中譯，簡介見下面乙部。

10、「新文學的傳統」，臺北，時報文化，一九七九。共收論文十八篇，凡三八〇頁。

下面把夏氏的中英文著述，分類列出。每類先列書，後列論文。論文部份，題目之後的數字表示完稿年份，再下面表示收於夏氏何書：「愛情・社會・小說」的簡稱，「文」爲「文學的前途」，「人」爲「人的文學」，「新」爲「新文學的傳統」的簡稱。

甲、中國古典小說與戲劇

一、書

「中國古典小說」。原著爲英文，題作 *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*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。論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金瓶梅」、「儒林外史」、「紅樓夢」六本長篇小說，書前有導論，末有附錄，題爲「中國短篇小說中的社會與個人」，另附參考書目及索引。全書共四一三頁。此書各章已譯爲中文，著者將校訂譯文後出版。

二、單篇論文

1、「戰爭小說初論」。「愛」。原文爲英文，題作 *The Military Romance 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*，收入 Cyril Birch, ed., *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* (Univ.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4)。

2、「『隋史遺文』重刊序」。一九七五，「人」。

3、「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——『鏡花緣』新論」。一九七三，「人」。原文爲英文，由黃維樑中譯。原文題作 *The Scholar-novelist and Chinese Culture: A Study of Ching-hua*

Yuan，刊於 *Tamkang Review* 五卷二期（一九七四年十月）。

4、「『老殘遊記』新論」。一九六八，「文」。原文爲英文，由黃維樑中譯。原文題作 *The Travels of Lao Ts'an: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*，刊於 *Tsing-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* 新七卷二期（一九六九）。

5、「熊譯『西廂記』新序」。「愛」。原文爲英文

，熊式一的譯本於一九六八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- 6、「湯顯祖筆下的時間與人生」。「愛」。原文為英文，題作 *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'ang Hsien-tsu*，收入 Wm. T. de Barry, et al, ed. *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* (N. Y., Columbia Univ. Press, 1970)

乙、中國現代文學

一、書

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。原著為英文，題作 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，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初版，一九七一年增訂再版。增訂本述評中國現代小說，至一九五七年為止。另加「尾聲」，題為「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」，還有兩國附錄：「現代中國感時憂國的精神」，「旋風」（姜貴小說名）。這本小說史所述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文學，只有姜貴的小說「旋風」屬臺灣方面的。此書中文本由劉紹銘等十五人合譯，於一九七九年

出版。中文本最後一個附錄，改題為「姜貴的兩部小說」，其餘大體上與英文本一樣。中英文本除正文之外，還有參考書目。中文本分香港友聯出版社版和臺灣傳記文學社版；香港版與英文原著一樣，附有索引，臺灣版則無索引。此外，內容方面，香港版和臺灣版無甚差異。英文增訂本凡七一七頁，中文本臺灣版凡五七五頁，香港版凡五九二頁。

二、單篇論文

1、「新小說的提倡者：嚴復與梁啟超」。原文為英文，約成於一九七四。中譯者為張漢良，譯文收於「人」。

2、「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」。一九七七，「新」。

3、「『胡適雜憶』序」。一九七八，「新」。序唐德剛所著書。

4、「胡適博士學位考證」。一九七八，「新」。

5、「小論陳衡哲」。一九七八，「新」。

6、「親情與愛情——漫談許地山、顧一樵的作品」。一九七九，「新」。

7、「『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』序」，一九七七，

「新」。序丁望所著書。

- 8、「臺灣小說裏的兩個世界」。一九七六，「新」。原文爲英文，乃劉紹銘編 *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: 1960—1970* (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76) 一書的序。由周兆祥譯成中文。

9、「『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』序」。一九六六，「文」。序於梨華長篇小說。

10、「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」。一九六九，「文」。

11、「教育小說家金溟若」。一九七四，「文」。

12、「『師友、文章』序」。一九七五，「文」。序吳魯芹散文集。

13、「琦君的散文（『書簡』節錄）」，一九七四，「人」。

14、「余光中：懷國與鄉愁的延續」，一九七五（？）「人」。本文爲英文論文 *The Continuing Obsession with China: Three Contemporary Writers* 中一節。英文原文刊於 *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* 六卷一期（

一九七五年春季號），譯者爲周兆祥。

15、「陳若曦的小說」。一九七六，「新」。

16、「陳若曦的第一篇小說」。一九七八，「新」。

17、「正襟危坐讀小說」。一九七七，「新」。評一九七七年「聯合報」小說獎作品。

18、「二報小說獎作品選評」。一九七八，「新」。

評一九七八年「聯合報」及「中國時報」文學獎作品。

丙、文學通論及其他

以下所列全爲單篇論文

1、「愛情・社會・小說」。一九五七，「愛」。

2、「文學・思想・智慧」。一九五八，「愛」。

3、「文學的前途」。一九七四，「文」。

4、「人的文學」。一九七六，「人」。

5、「追念錢鍾書先生——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」。一九七六，「人」。

6、「勸學篇：專覆顏元叔教授」。一九七六，「人」。顏氏有文評「追念」一文，夏氏爲此篇，以評顏文。

- 7、「重會錢鍾書紀實」。一九七九，「新」。
- 8、「『林以亮詩話』序」。一九七六，「人」。
- 9、「陳荔荔、馬瑞志、余國藩——介紹三種中國名著的譯者」。一九七七，「新」。
- 10、「何懷碩的襟懷——『域外郵稿』序」。一九七七，「新」。
- 11、「黃維樑的第一本書——『中國詩學縱橫論』序」。一九七七，「新」。
- 12、「亡兄濟安雜憶」。一九六五，「愛」。
- 13、「夏濟安對中國俗文學的看法」。一九六五，「愛」。
- 14、「寫在『濟安日記』前面」。一九七四，「人」。
- 15、「關於夏濟安譯『莫斯科的寒夜』」。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九及卅日刊於『聯合報』副刊。
- 16、「悼念陳世驥——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」。一九七一，「文」。
- 17、「悼詩友盧飛白」。一九七二，「文」。
- 18、「五四雜感」。一九七九，「新」。
- 19、「『大亨小傳』——一則不朽的『愛的故事』」

。一九七一，「文」。

- 20、「文學雜談」。一九七三，「文」。本文談論龐德(E. Pound)、威爾遜(E. Wilson)、溫脫斯(Y. Winters)、坡易斯(J. C. Powys)等美國作家。

21、「A·赫胥黎」。一九七〇，「文」。

- 22「克萊娥蒙難」，一九七六，「新」。本文談論的是美國當代史家 Jacques Barzun。

丁、其他用英文寫的論文和書評

"To What Fyn Lyve I Thus?—Society and Self in the Chinese Short Story," *The Kenyon Review*, XXIV (Summer 1962).

"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*Water Margin*," *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*, No. 11 (1962).

"Residual Femininity: Women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," *The China Quarterly*, No. 13 (1963). Reprinted in Cyril Birch, ed., *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*

- (Praeger, 1963).
- "Love and Compassion in *Dream of the Red Chamber*," *Criticism*, V, No. 3 (1963).
- "On the 'Scientific'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" *T'oung Pao*, L, Nos. 4-5 (1963).
- "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Chinese Temper," *Literature East & West*, VIII, Nos. 2-3 (1964). Reprinted in Chi-pao Cheng, ed., *A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* (New York, Paragon, 1964).
- With T. A. Hsia. "New Perspectives on Two Ming Novels: *Hsi-yu chi* and *Hsi-yu pu*," in Chow Tse-tsung, ed., *Wen-lin: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*.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, 1968.
- "Chinese Novels," *Columbia University Forum* (Spring 1968).
- "A Critical Introduction," in S. I. Hsiung, tr., *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*.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8.
- "Introduction," in Tsi-an Hsia, *The Gate of Darkness: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*.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68.
- "Crabbe's Poetry: Its Limitations," *Tamkang Review*, I, No. 1 (Taipei, 1970).
- "Literature and Art under Mao Tse-tung," in Frank Trager & William Henderson, eds., *Communist China, 1949-1969: A Twenty-year Appraisal*.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, 1970.
- "Pope, Crabbe and the Tradition," *Tamkang Review*, II, No. 1 (1971).
- "Foreword" to Wu Ching-tzu, *The Scholars*. Trans. by Yang Hsien-yi & Gladys Yang. New York, Grosset & Dunlap, 1972.
- Eleven biographies of Chinese writers,

ancient and modern, in McGraw-Hill's *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* (New York, 1973).

"Foreword" to Joseph S. M. Lau, ed., *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: 1960 — 1970*.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76.

Review of Chao Chung, *The Communist Program for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*, and Albert Borowitz, *Fiction in Communist China. Far Eastern Quarterly* (August 1956).

Review of Wu Shih-ch'ang, *On the Red Chamber Dream.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(JAS) (November 1961).

Review of K. C. Wu's novel, *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. Saturday Review* (July 7, 1962).

Review of Richard Martin, tr., *Jou Pu Tuan* (*The Prayer Mat of Flesh*). JAS (February 1964).

Review of Bauer & Franke, eds., *The Golden Casket. Saturday Review* (December 5, 1964).

Review of Lai Ming, *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 (July-September, 1965).

Review of D. W. Fokkema, *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, 1956—1960*. JAS (August 1966).

Review of Liu Ts'un-yan, *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. JAS* (November 1968).

Review of Merle Goldman, *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. Literature East & West*, XII, Nos. 2-4 (1968).

Review of Glen Dudbridge, *The Hsi-yu chi. JAS* (August 1971).

Review of Ernst Wolff, Chou Tso-jen,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XCIV, No. 4 (1974).

Review of H. C. Chang, *Chinese Literature:*

(1979).

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.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, XXXIV (1974

).

Review of Andrew Plaks, *Archetype and*

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.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

(這個目錄並不完整。夏氏還有若干文章、札記、書簡等，中英文都有；因為資料不足，未及列入。夏氏少年生活回憶、談電影等文章，也未列入。他譯了好幾篇中國小說為英文，這裏也沒有包括在內。以後有機會，當一一補充。)

書是人生錦囊，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？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，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！連手續費都不必付的——讀書就有這麼好！

一個讀書的故事

亮軒 著

35元